

自序

李振盛

半世紀前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尚不到三年。文革十年裏，我拍攝了近十萬張底片：主要是為報紙需要而拍照片，當時稱為「有用的照片」；同時還拍了許多絕不可能見報的照片，稱為「沒用的照片」。每當拍了給文革「抹黑」的沒有用的照片，我要等同事都下班後，獨自鑽進暗房裏沖洗這些危險的底片，烘乾後把「負面」底片剪下來收好，藏在我的資料櫃或辦公桌抽屜自己設計的暗層裏。1968年春，黑龍江省一把手潘復生發動一場反右傾運動，我預感自己不久將被殺進報社的「支左小將」打倒，便陸續將「負面」底片轉移到家中。為防抄家時被發現，遂在平房木地板上鋸了一個洞口，擔心鄰居聽到動靜，由妻子祖瑩俠站在窗口望風，用了一個多星期才完成。之後，我將文革最激烈的頭三年裏拍攝的約兩萬張「負面」底片藏在地板下，再壓上桌子。這地板下藏底片的辦法，讓我在這年年底遭到批鬥且被抄家時躲過一劫。今天的人們才能看到這些完整記錄文革歷史的照片。

文革期間，幾乎所有人的生活都高度同質化，但我還過著另一重不為人知的秘密生活。其實當時的我並不完全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是為了革命，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未來，只是有一種朦朧的歷史使命感。有人說，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對此我不敢苟同。正因為人生苦短，歲月飛逝，更要抓緊去感受生活，觀察社會，留下瞬間的痕跡，以防人類記憶失落。

我的攝影生涯受到東西方兩位攝影大師的深刻影響：一是曾在延安為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拍照的吳印咸大師，他在當年為我們講課時說：「攝影記者不僅僅是歷史的見證人，還應當是歷史的記錄者」。二是法國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Henri Cartier-Bresson) 大師，1960年8月中國對他的「決定性瞬間」理論及其作品展開大批判，但我從中受到啟迪，並以「逆向思維」領悟他的攝影真諦且實踐之。時隔43年後，他因看過《紅色新聞兵》法文版而盛情邀我在法國阿爾勒會面，竟破天荒地請我給他拍照並合影，他說：「我們都是記錄歷史的同路人」。正是這兩位東西方的大師讓我有記錄歷史的使命感，覺得這些場面應該拍下來，留待後人去評說。雖然還在懵懂之間，但文革爆發不久後，我感覺到周圍發生的事已開始超越正常的軌道，這種感受也體現在我的拍攝之中——你們或許會發現，我在有意無意之間試圖尋找某種角度或構圖，來表現我認為這一切已經開始有些瘋狂與荒唐。

1996年10月，我應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之邀赴美訪問講學，便陸續把三萬多張底片帶到美國。2000年起開始在紐約與聯繫新聞圖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總裁羅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合作，花費三年多時間整理編輯這些底片。2003年6月，《紅色新聞兵》(*Red-Color News Soldier: A Chinese Photographer's Odyssey Throug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由英國菲頓(Phaidon)出版社以英、法、德、意、西、日六種語言出版。發行後反響遠超預期，好評如潮，也榮獲多項國際大獎。但我心裏始終掛念的是，能儘快讓中國同胞及全球華人看到這份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記錄。

諸神默默，讓照片說話。隨著歲月流逝，油然產生訴說衝動，極欲向國人圖說文革，且愈來愈強烈。沒想到中文版《紅色新聞兵》的出版，竟是在英文版面世十五年之後。期間有多家中國大陸及港台出版社與我聯繫，但最終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無果。在我心中，由一家學術性的機構出版《紅色新聞兵》中文版是最理想的選擇。常言說「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7年5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我聯繫。我很高興最終是由這間具有學術公信力的出版社擔綱出版，讓這份影像檔案完整地呈現在中文讀者面前。

從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我討論出版思路開始，我們就達成一項共識，在英文版的基礎上，做一本給中國人閱讀的影像歷史書。因此，無論是照片的選擇或編排，都和英文版有所不同。中文版增補與替換了五十多張照片，自述部分增加文字萬餘言，展現更豐富更複雜的歷史細節。為佐證故事的真實性以及對歷史負責，對敘述中的當事人有區別地點出了姓或者名。另一方面，中文版在編排時更加注重敘事感和節奏感，像電影剪輯一樣組合特寫、近景、遠景、全景等景別，使書中的線索和主題更加清晰，故事性更強。同時也突出了英文版中不起眼但對中文讀者來說意味深長的照片，例如「四清」運動中萬人對敵鬥爭大會主席團成員討論對「四類分子」判決的照片(第40頁)，這個決定命運的時刻，靠的僅是幾個主席團成員興高采烈的即興判決，視法律於不顧——這是典型的文革之預演。此外，書中的設計更加注重對頁的關係，比如將表演節目的天真孩子與表達忠心的虔誠士兵放在一起，直觀地體現了文革中兒童的成人化與成人的兒童化(第224-225頁)——這些改動看似並不明顯，卻在整體上提升了整本書的味道感覺與觀看體驗。

「讓歷史告訴未來」，是中國前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為這本書的題詞。如今距離文革爆發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這本《紅色新聞兵》書中的場景和氛圍看起來並不太遙遠，對文革親歷者來說仿如昨日。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2018年5月16日寫於紐約無為齋

前言 攝影與歷史

羅伯特·普雷基 (Robert Pledge)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八個月後，李振盛和他的造反小組「紅色青年戰鬥隊」，得到北京「全國新聞界革命造反者總部」頒發的印有毛澤東手書的「紅色新聞兵」袖章，《紅色新聞兵》書名 (*Red-Color News Soldier*) 就是按此字面含義而來。雖然還有其他更加通順的名稱，但是都無法保留這幾個字合在一起所表現出來的韻味。

長期以來，在西方世界中，對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有人持驚訝態度，還有人心存喜歡，但很少有人誠惶誠恐地看待文化大革命。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世界各地鬧事的學生都對紅衛兵指責謾罵、高呼口號的做法感到歡欣鼓舞，安迪·沃霍爾 (Andy Warhol) 在紐約完成了著名的毛澤東絲綢畫像《偉大的舵手》。直到今天，與我們所見所聞的當代中國社會相比，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混亂景象可能仍然略帶浪漫和理想色彩。

有鑒於此，必須通過更加清晰和真實的畫面再現在中國發生的那場黑白顛倒的浩劫——文化大革命。李振盛就是這樣一位不二人選，他通過超凡卓群的攝影作品，真實再現了當時的場景。經李先生同意，本書在出版前定下了一系列準則：所有照片都不進行剪裁；所有圖片都儘量準確地按照年代順序排列，以最佳地反映歷史進程；所有圖片都配有準確的文字說明，並通過進一步調研予以核實，還與李振盛工作近20年的《黑龍江日報》的報紙檔案進行核對。

在編輯《紅色新聞兵》的幾年時間裏，李振盛向聯繫新聞圖片社紐約公司送交了大約3000個牛皮紙小信袋，信袋用橡皮筋綁在一起，按照年代、時間、地點、膠卷類型和其他標準分類，而分類標準也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每個信袋裏面存放若干張底片，每張底片都裝在半透明底片袋中。當年，李振盛先生把每卷膠片剪開，分別藏匿，有的底片一直沒有動過。李先生在每個信袋上都用漂亮的中國字書寫了文字說明，認真註明地址、名稱、人名、職務和具體事件。李先生的書面敘述清楚表明，他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從2000年到2003年的三年多時間裏，李振盛先生、翻譯江融、英文文字作者傑克·米納什 (Jacques Menasche) 和我本人，後來李先生的女兒笑冰也加入進來，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聚在一起，共同拼合這段我們所知不多的歷

史。當時的工作十分繁重，但大家討論熱烈。我們翻閱了浩瀚的檔案資料和學術資料，進行訪談，查閱圖片，還傾聽李先生唱文革時期的革命歌曲。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整個中國都變成了一座大戲院，觀眾逐步成為這台大戲的演員。從參加「批鬥會」的最貧窮的農民到受盡侮辱、低頭認罪的「階級敵人」，從很少公開露面、從吉普車上向群眾揮手致意的領導人到被打倒的人和打倒別人的人，從造反派到反革命分子、紅衛兵和保守派，無不扮演著各自的角色。紅袖章和紅旗、標語、大字報、紅寶書都成了道具，整個舞台被幕後的巨人所操縱，數百萬人環繞左右，有人高呼口號，有人沉默不語。

但是，因為有了李振盛先生，看似不知名的面孔和地點也有了名稱或身份。李先生把看似不太真實的事件變成了真真實實的事件。通過他的鏡頭，本來十分遙遠的人物和事件顯得十分親近和平常，又是那麼熟悉。文化大革命給急於改變整個世界的新一代人提供了發泄不滿和憤怒的機會，但是當權者利用這股力量達到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目的：牢牢掌控權力。1960年代末，在世界其他大洲的一些城市同樣爆發了學潮，但是都沒有像中國那樣嚴重和暴力。

我們將永遠感謝李振盛先生，他冒著巨大的風險完整地保留了數以萬計的歷史見證照片。要知道當時他的中國同行大多數都不拍攝「負面」照片，少數拍了的也大多銷毀了手中的膠片。從本書刊載的李振盛先生的多張個人自拍照可以看出，青年時代的他不斷探究自我，希望給後人留下自己的生活軌跡以及他追求個性和更美好世界的夢想。的確，歷史是李先生最大的關切，也是本書的主要宗旨所在：重溫並牢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揮之不去的悲劇事件。正如德高望重的中國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給本書的題字：讓歷史告訴未來。